

調査報告

現代新儒家と臺灣國立中央大學

水 野 厚 志

東京国際大学論叢 人文・社会学研究 第11号 抜刷
2026年（令和8年）3月20日

調査研究

現代新儒家と臺灣國立中央大學

水 野 厚 志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of Taiwan

MIZUNO, Atsushi

Abstract

Modern Neo-Confucianism is a highly popular research group in Taiwan; however, its existence is virtually unknown in Japan. Here, I wish to introdu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nd Modern Neo-Confucianism—a particularly overlooked and underexplored association—by translating an article written by Professor Yang Ziping, Dean of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Keyword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Modern Neo-Confucianism

要 旨

2023年、縁があり臺灣國立中央大學で海外研修をする機会を得、當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家）の第一人者である楊祖漢先生の元で研究調査をすることが出来た。

當代新儒家は臺灣では非常にポピュラーな研究グループであるものの、残念ながら日本では殆どその存在は知られていない。一部の書籍を介して、その存在をようやく知ることが出来る。

その代表的な著作は中島隆博の「新儒家と佛教—漱溟、熊十力、牟宗三—」と『中國哲學史』、朝倉友海の『「東アジアに哲學はない」のか—京都學派と新儒家』である¹⁾。特に後者の朝倉友海の著書は、日本の京都學派と新儒家（宋明理學の新儒學でなく、臺灣を中心に活動している當代

新儒家といわれる學派)を取り上げ、西洋の近代哲學と對峙し、超克しようとさえしたその兩者を、れっきとした近代哲學であるとして紹介している。

當代新儒家の主な活動據點、著作物の發行等については、研究活動支援の機關として政府主導の中央研究院があるが、他に大きな影響を持つ教育研究・啓蒙活動の場として臺灣國立中央大學が挙げられる。また、現代新儒家の巨頭 牟宗三の直弟子を中心に創刊された月刊『鵝湖』・季刊誌『鵝湖學志』への投稿、『鵝湖學術叢刊』を通して著書の出版といった論文・著書を上梓する場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さらに不定期だが、講演會・討論會が「鵝湖人文書院」や「奉元書院（清朝の後裔、愛新覺羅 毓鋌の創設した書院）」、臺灣國立中央大學などで開かれている²⁾。ここでは、中でも盲點となっていて餘り知られていない臺灣國立中央大學と現代新儒家との關係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学院院长 楊自平教授の文章を翻譯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紹介したい³⁾。

キーワード：現代新儒家、臺灣國立中央大學

當代新儒家與中央大學

楊自平

當代新儒家對近現代學術思想發展有極大影響力。劉述先先生曾提出三代四群說，第一代第一群的代表為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第二群的代表為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其中，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四位先生皆曾與中央大學結緣⁴⁾。熊十力先生是唐先生及牟先生的老師，1885年2月18日出生於湖北黃岡，1968年5月23日逝世。原名繼智，升恆，定中，後改名十力，號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1928年，熊先生44歲到中央大學講學，也因此唐君毅先生得以親炙問學。同期，高贊非先生輯錄熊先生平日語錄及筆記，整理成《尊聞錄》一書。這段時期，熊先生原本專注佛敎唯識學的研究，逐漸轉向，發展出自己的哲學系統，奠定日後「新唯識論」思想的基礎，《新唯識論》文言本於1932年出版。次年熊先生因病重返回武昌養病。

熊先生少時參與革命，自忖非經世之才，轉而致力治學，曾出入佛學空，有二宗，其後深悟《易》道，歸宗孔子。其學宗主《易經》，以體用不二為思想核心。《新唯識論》談心性與修養，主張心性幽微，然不受形氣所囿，透過修養，學習得以顯發心性本體清明，流行不已。其後又進一步發展出《體用論》解決宇宙論的存有問題，主張肯定宇宙實體，此為萬物之根源與法則，宇宙實體自身具生生不已之發用，本體之發用具有精神性與物質性，能生化萬物。整個宇宙無時空斷限，過去，現在，未來為一大全體。人具有宇宙實體賦予特殊的精神性，故能成就人文，參贊化育。此乃熊先生思想特色所在。

方東美先生，1899年出生於安徽桐城，1977年7月13日離世，原名珣，字東美，是清代桐城派創始方苞先生十六世孫。1921年赴美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哲學，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旋及進入俄亥俄州立大學就讀，一年後回到威斯康辛大學，並通過博士考試。留美期間先後鑽研實用主義及希臘哲學。1924年回國，受聘武昌師範大學（現武漢大學前身）副教授，主授西方哲學。次年獲聘東南大學（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前後凡20年，曾擔任系主任，文科研究所哲學部主任。

方先生五十二年的教學生涯，傳世著作多為演講集或單篇論文，唯於57歲寫一部英文論著《中國人生哲學》。方先生自道思想底蘊是「儒家的家庭傳統，道家的生命情調，佛家的宗教信仰，以及西方的學術訓練。」他好用涵括，對比的方式立說，曾指出先秦哲學三大家的思想特色，老子論道，

重慈惠，孔子談元，重忠恕，墨子主愛，談愛利。對於儒，道，釋三家的特色，則指出「儒家意在顯揚聖者氣象，道家陶醉於詩藝化境，佛家則以苦心慧心謀求人類精神之靈明內照。」方先生並曾指出中，西思想的區別，中國思想的特色「把宇宙與人生打成一氣來看」，「與天地合德，與大道周行，與兼愛同施的理想人格。」對於西方則以希臘悲劇的衝突性作代表，曾云：「乾坤一戲場，生命一悲劇！平生最服膺此兩句名言，故立論持說時常以此為譬喻⁵⁾。」方先生對中國哲學是有期待的，曾感慨：「我們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們的天才埋沒到哪裡去了？」「中國民族的哲學在乾嘉時代就死亡了，一直到民國時代都沒有復興。」因此，他提出一流的哲學家透過「聞」，「思」，「修」的工夫成就智慧，「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聞入於思，思修無間，兼具三慧，方功德圓滿⁶⁾。他也提出成就完美人格的三階段：由自然人，活動人，理性人，發展至第二階段的藝術人，道德人，宗教人，進階到第三階段高貴人，神性，不可思議的神明境界。這是方先生為後人留下的珍貴哲學智慧。

唐君毅先生於1909年1月17日生於四川宜賓柏溪鎮周壩村，1978年2月2日卒於香港九龍浸會醫院。17歲畢業於重慶聯中，然後赴北平中俄大學，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北平肄業一年半後，便轉讀東南大學哲學系，副修文學系。1932年，23歲畢業於中央大學哲學系。1933年冬，友人許思園赴美國留學，推薦唐先生回中央大學代替自己擔任助教一職。當時助教月薪只有八十元，唐先生將四分之三的薪資寄回家中，僅留四分之一自用。這段期間，唐先生開始在多份雜誌月刊發表哲學論文。

1940年，唐先生始與牟宗三先生結識，是年十月，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宗白華先生邀唐先生重返中央大學哲學系任講師。隔年，唐先生創辦《理想與文化》期刊，並升任副教授。1944年，唐先生升任教授，並擔任系主任，建議增聘許思園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後來因人事糾紛，系內要解聘兩位先生的教職，基於朋友道義，唐先生決意離開中大，與牟，許二先生於1947年秋季至新創的江南大學任教，但中大不肯放人，幾經周折，只允請假一年。同年秋，唐先生把母親陳太夫人及夫人謝廷光等家眷移居無錫，方得以事奉母親經年。1948年冬，共軍南下，直逼長江，中央大學宣告停課，其後唐先生亦未再回中大任教。

唐，牟二先生雖然都會親炙熊先生，對熊先生體用不二的哲學亦予高度肯定，但兩人都自覺走更寬廣的學術道路，故未能順從師意願成為獨門傳人。

唐先生的學問得自對人生真切的體會，具有動人的力量。他肯定人具有既內在而超越的道德自我，透過擴充內在的仁心，此仁心即天心，超越的涵蓋自然與人生，並普遍化此仁心，以觀自然與人生的一切，並實現於自然與人生以成就人文。雖身處花果飄零的年代，然以靈根自植自勉，期為國族，甚至人類的未來找出新方向。他認為中國哲學與道德政治之精神，皆出自原始的敬天精神，因此，中國文化非無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攝於人文，此可補西方宗教精神所不足，並可為中國未來新宗教的基礎。並揭示有本有源的中西文化會通方式，藉太極，人極，皇極，三極一貫，說明「圓而神」的中國文化精神，可涵攝「方以智」的西方文化，以展開中國未來的人文世界⁷⁾。以上便是唐先生思想精髓之所在。

牟宗三先生字離中，1909年6月12日生於山東棲霞縣牟家疇，1995年4月12日病逝臺大醫院。1945年，時值37歲，任教於成都華西大學，秋初，牟先生自成都到重慶，受聘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始與唐君毅先生共事。兩人課餘之暇常切磋論學，相知最深。兩人對國族前景，深為擔憂，牟先生遂有撰寫「歷史哲學」的念頭。1946年春，隨中央大學自重慶遷回南京，該年秋，先生輪任中央大學哲學系主任，隔年仍任系主任一職，1月時獨力創辦《歷史與文化》月刊，後因經費無著，僅出版四期。該年暑期，牟先生因任系主任之故而遭受譏誣，校方竟不發聘書。唐先生出面為牟先生爭公道，但沒有結果。秋季，牟先生應金陵大學，江南大學兩校專任教授之聘，往來於南京，無錫間。唐先生亦離開中央大學，轉任江南大學教務長。1988年11月1日到12月22日，牟先生與中央大學第

二次結緣，受邀在現在的中央大學文學院擔任講座，講授康德哲學，隔年4月18日到5月23日，又於中大講授康德美學。當時講課教室在文一館107教室，校內，外師生聽講者甚眾，爭睹牟先生講學風采。有幾次講課，是由蕭振邦教授協助板書。臺下聽眾時而專注聽講，時而振筆疾書，個個全神貫注，牟先生鏗鏘有力的話語，不斷在教室迴盪。

牟先生一向與人嚴謹之感，殊不知在文學及遊於藝方面，亦有精彩處。牟先生對《紅樓夢》，《西遊記》亦曾鑽研並作評論，在新亞任教時，好與人下棋，落子如風；餘暇亦好京戲，曾露一手「打漁殺家」。

牟先生的學問，融攝中西，歸本孔孟。他曾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透過真實生命的覺醒，向外開出建立事業與追求知識的理想，向內滲透此等理想的真實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為理想，此便是生命的學問的全體大用。在通透中國哲學方面，他致力探究先秦，魏晉，隋唐，宋明各階段的思想特色，尋出中國哲學的核心；在融攝西學方面，他認為康德哲學重道德與中國哲學較相應，並將康德「超絕形上學」，導入「智的直覺」發展出「道德的形上學」。與唐先生一樣，身處文化飄零的年代，深以為欲救國族慧命，不能靠西方純邏輯思考的哲學，須求助能開闢價值之源的孔孟之教。牟先生自言，相較唐先生透過重在正面疏通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價值，使人對於中國文化有恰當之理解，他則重在批評抉發中國文化的癥結，以期蕩滌腥穢，開出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途徑，進而提出儒家的當前使命在於開出對列之局以開出新外王⁸⁾。具體作法便是透過良知自我坎陷，一心開二門，於道德心外，發展理性作用，掌握科學知識，學習民主精神⁹⁾。如此方能使儒學在現代繼續發展，擔負他的使命。此便是牟先生思想的大要。

到了第四代，唐先生，牟先生的弟子王邦雄，曾昭旭，岑溢成，朱建民，袁保新諸位先生，在余傳韜前校長力邀下，先後進入中央大學文學院任教。據王邦雄，曾昭旭兩位先生引述，余傳韜前校長雖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化學博士，但深受家學影響，非常重視人文。余前校長的父親正是著名教育家余家菊先生。在家學薰陶下，余前校長本深具有濃厚的人文涵養，非常重視人文教育。鑑於中央大學的發展偏向理工學院，故希望提升文學院在整個中央大學的地位，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使中央大學在發展理工專業餘，亦具有高度的人文素養。

正因余前校長有此治校願景，遂不斷留意人文學界的發展，對新儒家有著高度關注，曾經到臺灣師範大學聽牟先生演講。會後，余前校長與臺師大的梁校長與牟先生走在一起，誠摯的邀請牟先生到中大演講。據王邦雄先生所述，當時他與另外兩位牟先生的學生，跟在牟先生身後，牟先生轉頭用手指著他跟余前校長說：「他講得比我好，你請他。」當時44歲處青壯期的王邦雄先生，便在這樣的機緣下，得到余前校長親自致電邀請到中大文學院演講。余前校長聽完「認知心德性心與現代化」的演講後數日，便致電當時在淡江中文系任教的王邦雄先生，希望聘他到中大任教。

當時余前校長滿懷理想，希望建立陣容堅強的人文團隊，改善中大校風並強化中文系的實力，也期盼成立中文研究所及哲學研究所。王邦雄先生也因此推薦在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任教的曾昭旭先生，及剛由香港新亞書院取得博士學位回臺的岑溢成先生，以及剛由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朱建民先生，這幾位先生都是在1985年進中大任教。1988年袁保新先生亦由王邦雄先生推薦到哲研所任教。1992年蕭振邦先生亦獲聘進入哲研所。

這幾位先生不僅有卓越的學術表現，亦同時具有行政管理長才。曾昭旭先生於1986至1988年擔任中文系系主任，於1987年任內成立中文研究所。隔年1988年哲學研究所成立，王邦雄先生擔任創所所長。數年後，王邦雄先生回到中文系體系，與曾昭旭先生，岑溢成先生同為中文系義理領域的臺柱；朱建民先生，袁保新先生則在哲研所發揮影響力。朱建民先生曾擔任哲研所所長，學務長，主任秘書等重要職務，現任華梵大學校長。袁保新先生亦曾任哲研所所長，總務長，主任秘書，及南華管理學院教務長，副校長，以及醒吾技術學院校長，現任明新科技大學校長。蕭振邦先生亦曾

擔任哲研所代理所長，所長的職務。

王邦雄先生在退休前兩年，希望能延續中文系義理傳統，於2000年向劉兆漢前校長推薦，在南華大學通識中心擔任副教授兼佛學研究中心主任的萬金川先生，隔年2001年又推薦在文化大學哲學系擔任教授的楊祖漢先生，校方以安排演講的方式，禮聘兩位儒學及佛學的專家。1996年李瑞全先生至中大哲研所任教，並曾擔任所長一職。

據王邦雄先生口述，他與曾昭旭先生差2歲，曾先生實際是1943年出生，岑溢成，楊祖漢，萬金川三位先生和他差10歲。在這幾位先生的努力下，在中大任教期間，成了中大最美的人文風景之一，不僅強化了中文系所及哲研所的師資陣容，也打響了文學院在中大的名號，讓中大成了新儒學發展的重鎮⁷⁾。

值得一提的是，李明輝先生，林安梧先生在中大兼課數年，尤其林安梧先生與中大結緣甚久，自1991年至今，分別在中文系及哲學所兼課，目前仍在哲研所開課。

值得一提的是，李明輝先生，林安梧先生在中大兼課數年，尤其林安梧先生與中大結緣甚久，自1991年至今，分別在中文系及哲學所兼課，目前仍在哲研所開課。

第四代新儒家學者，在熊，唐，牟諸位前輩的成就下，繼續思考儒學的發展性。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繼續宣揚師說，將前輩的思想加以闡釋並略作調整，李明輝先生對牟先生在康德哲學的論述上有補正之功，楊祖漢先生致力宋明理學的研究，近年來主要關注朱子思想的詮釋，透過康德，韓國儒學，對牟先生的觀點提出新的詮釋。二是找出新的發展方向，王邦雄先生致力老，莊哲學，曾昭旭先生受唐先生《愛情福音》之啟發，發展出儒家的愛情學，兩位透過校內外講學及大量著作，對現代人的身心安頓有極大影響。袁保新先生則將牟先生以康德哲學為進路詮釋中國哲學，轉向以海德格哲學為進路，對孟子及老子思想的形上學部分提出新的見解。蕭振邦先生則致力發展中西美學，有許多精彩見地。

岑溢成先生則透過學術研究，對中國哲學提出極富洞見的看法，主要有兩方面，即哲學議題新探與經學研究。哲學議題新探方面，包括重探孟，荀思想，指出孟告之辨具有倫理學意義，對楊墨的批判是基於人倫立場，並指出荀子為積極的人文主義者。論魏晉思想，著重王弼的「大衍義」及「名」，「稱」之辨及「名」，「稱」的兩種使用，並扣緊魏晉的重要論題「言意之辨」指出「言意之辨」的兩個層面，且指出嵇康的獨特處在於透過實踐展現莊子思想⁸⁾。隋唐學術則致力於窺基《因明大疏》之研究，並對印度佛教的「因明學」作深入探討⁹⁾。宋明學術則關注朱熹的思想系統及透過王艮（心齋）的「安身」說見出王學泰州派思想之特色¹⁰⁾。清代學術則關注阮元，戴震及焦循的人性論。經學研究這部分，明顯補足前輩先生的不足，包括漢代，宋代，清代經學，尤以清代經學為要。包括致力乾嘉焦循，惠棟，王念孫父子的《易》學研究，並對清代學術史「漢宋之爭」，「吳皖之別」的公案提出精彩見解¹¹⁾。其貢獻在透過紮實的中西學根柢，致力找出並解決重要的學術問題。

林安梧先生致力思考「後新儒學」的可能性，期建立新的思想體系，於牟先生「兩層存有論」之後，進一步提出「存有三態論」，並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而開啟了一批批判性思維，強調「社會公義」優先於「心性修養」，主張「由現代化新外王的學習」進一步重新調節出一「公民社會」下的「倫理道德」。並思考以建立儒，道，佛三教意義治療學的可能性，並思考「中國詮釋學」議題。

近年來，文學院為推展儒學研究，於2002年由中文系及哲研所共同成立院級的儒學研究中心，楊祖漢先生擔任四任中心主任，不斷推展學術活動，包括舉辦學術會議，讀書會，每年出版兩期《當代儒學研究》，近三年更連續舉辦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對推展中大的儒學研究有所助益。

當代新儒家的四代學人，從南京時期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到中大在臺復校，皆與中央大學結下深厚的緣分。第一代的熊，唐，牟三位先生，他們在儒學的深刻造詣及憂國憂民的情懷，樹立當代儒學的最佳典範，也為中央大學的人文發展確立長遠的目標。期許中央大學未來成為國際儒學研

究重鎮、肩負傳承文化慧命的重任、爲時代注入豐厚的人文精神。

現代新儒家と臺灣國立中央大學

楊自平

現代新儒家は、現代の學術思想の發展に大きな影響を與えてきた。劉述先氏はかつて三世代四グループ（の分類）を提案したが、第一世代第一グループの代表は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第二グループの代表は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とした。また、第二世代第三グループ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であり、第三世代第四グループは、餘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としている。中でも、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の四人はすべて中央大學と關係を持っている。

熊十力氏は、唐氏と牟氏の教師で、1885年2月18日に湖北省黃崗で生まれ、1968年5月23日に亡くなった。原名は繼智、升恆、定中で、後に名を十力に改めた。號は子眞、晩年は漆園老人と號した。1928年、熊氏が44歳の時、中央大學で講義を行うことになり、唐君毅氏は親しく接してその感化を受け、學問を追究することが出來た。同じ時期に、高贊非氏は熊氏の通常の記録とメモを編集し、それらを『尊聞錄』という本にまとめている。この時期に、熊氏はもともと佛教の唯識學（認識論）の研究に焦點を當てていたが、徐々に自身の哲學系統の發展に目を向けるようになり、文語體で書かれた『新唯識論』を1932年に出版した。翌年、熊氏は深刻な病氣のために武昌に戻って療養した。

熊氏は若い頃に革命に参加し、自分には世俗的な才能がないと推察し、力を盡くして學問を治め、佛教の空宗と有宗の二宗に出入りし、その後深く『易』の道を悟り、孔子に回歸した。その學は『易經』を本旨とし、體用不二（本體と作用は對立していて二元的に見える事柄も、絶對的な立場から見ると對立がなく一つのものであるという考え）を思想の中心にしている。『新唯識論』では、心性と修養について語る。心性は機微で、形と氣に縛られず、修養と學習を通して、心性の本體は澄んでいることを顯彰・發揮することが出來、廣く行われて止むことは無いのだと主張する。その後、さらに一步進めて發展させて『體用論』を提出し、宇宙論の存在の問題を解決し、宇宙の實體を肯定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た。そこで萬物の根源と法則は、宇宙の實體それ自身が備えている生成變化して止むことの無い運用であり、本體の運用には精神性と物質性を備えていて、萬物を生成變化させることが出來るとした。

全宇宙は時空の境界は無く、過去・現在・未來は大きな全體である。人間は宇宙の實體が賦與した特別な精神的な性質を持っているので、人文科學を達成することができ、萬物を生成發育させることに參與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が熊氏の考え方の特徴である。

方東美氏は、1899年に安徽省桐城縣で生まれ、1977年7月13日に亡くなった。原名は珣、字は東美で、清王朝の桐城派の創設者である方苞氏の十六代目の孫に當たる。1921年、ウイスコンシン大學で哲學を研究するために米國に赴き、2年後に修士號を取得した。次いでオハイオ州立大學に通い、1年後にウイスコンシン大學に戻り、博士號試験に合格した。アメリカ滞在前後、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とギリシャ哲學を學んだ。1924年、中國に戻り、武昌師範大學（武漢大學の前身）の准教授に任命され、主に西洋哲學を教えた。翌年、東南大學（1928年に中央大學と改稱）の哲學科教授に就任し、前後およそ20年間、學科主任・教養研究所の哲學部の學部長を務めた。

方氏の52年間の教職歴の中で、世に傳わっている著作の多くは講演集或いは單篇の論文だが、唯一57歳の時、英語の論著『中國人生哲學』を書いている。方氏のいう思想の内情とは、「儒家の家族の傳統、道家の生活の情調、佛家の宗教の信仰、そして西洋の學術訓練」に及んでいる。彼

は包括したり対比したりする方法を好んで使用して説を立て、かつて先秦哲學の三大家の思想の特色を、老子は道を論じ、慈恵を重んじる、孔子は元(玄)を述べ、忠恕を重んじる、墨子は愛を中心にし、愛利をいう、と指摘した。儒、道、釋の三家の特徴に對して、「儒家の考えは聖者の氣概を表彰することに在り、道家は詩歌藝術の精華に陶醉し、佛家は(物事を成し遂げようと色々試みたり考えたりして苦勞する)苦心・(宇宙の眞理を達觀しうる空闊明朗な心である)慧心によって人間の精神の内なる照明を求める」と指摘している。方氏はまた、中國思想の特色は「宇宙と生命を一つの氣によって見る」、「天と地とを徳によって調和し、大道とどこまでも廣がって行き(とどまるところが無く)、兼愛とともにとりおこなう理想的人格(を求めること)」であるが、西洋に對してはギリシャ悲劇の葛藤が代表すると指摘し、「乾坤一戯場、生命一悲劇(宇宙の展開はドラマであり、人生のテーマは悲劇である)」という一生で最も心にしっかりと留めて決して忘れないこの二句の名言のために、議論の場でしばしば比喩として使用される」と言っている。方氏は中國哲學に期待を寄せており、「私たちの民族はもともと生まれつき極めてすぐれた才能を備えた民族だが、私たちの才能はどこに埋葬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か」、「中華民族の哲學は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がその全盛期)で死亡し、ずっと中華民國の時代までまったく復活はなかった」と嘆いたことがある。そこで、彼は一流の哲學者は、「聞」・「思」・「修」を通じてよく考え研究することで物事の眞理(ありのままの眞實の姿)を把握する知的な心の働きの苦惱を消盡する精神作用を成し遂げ、「(般若の)聞所成慧(書籍や聽講による知識、知恵)、思所成慧(思考や理論的推論による知識、知恵)、修所成慧(直接的なスピリチュアル經驗から得た知識、知恵)」は、「聞」から「思」に入り、「思」・「修」は無限であり、三慧を併せ持つことによって、やっと積み重ねた功德は圓滿に解決すると提案した。彼はまた完璧な人格を完成させる三階段—自然人・活動人・理性人から、第二段階の藝術人・道徳人・宗教人に進化し、第三段階の高貴人・神性・不可思議の神明境界(言葉で表したり、心でおしはかたりできない神々の領域)へと進む—を打ち立てた。これは、方氏が將來の世代に残した貴重な哲學的知恵である。

唐君毅氏は、1909年1月17日に四川省宜賓縣柏溪鎮周壩村で生まれ、1978年2月2日に香港九龍の浸會醫院で亡くなった。17歳で重慶聯中を卒業し、北平市の中俄大學に通い、後に北京大學哲學科に入學した。北平で1年半在學した後、東南大學哲學科に編入し、文學部を副専攻した。1932年、23歳で中央大學哲學科を卒業した。1933年の冬、友人の許思園は米國に留學し、唐氏に中央大學に戻り自分に代わって助手の仕事をするを勧めた。當時助手の月給は80元に過ぎなかったが、唐氏は給與の4分の3を家に送り、わずかに残った4分の1を自分のために使った。この間、唐氏はいくつかの月刊誌に哲學論文を發表し始めた。

1940年、唐氏は初めて牟宗三氏と知り合ったが、その年の10月、中央大學哲學科長の宗白華氏は唐氏を招いたので中央大學哲學科に戻って講師になった。翌年、唐氏は雑誌『理想と文化』を創刊し、准教授に昇格した。1944年、唐氏は教授に昇格し、學科長を兼任し、許思園及び牟宗三氏の採用を提案した。その後、人事紛争により、學科内で2氏の教職を解かなければならず、友人に對する道徳心に基づいて、唐氏は中央大學を去ることを決め、牟・許の二氏は1947年の秋に新しく設立された江南大學で教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が、中央大學は彼を手放すことを拒否し、紆餘曲折を経た後、1年間の休暇を取ることにしか許されなかった。同じ年の秋、唐氏は母親の陳夫人と妻の謝廷光、その他の家族を無錫に移し、幾年も母親に仕えることができた。1948年の冬、共産軍が南下し、長江に近づいたとき、中央大學は授業の停止を宣告し、その後唐氏は二度と中央大學に戻って教え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唐・牟の2氏はどちらも熊氏に親炙し、熊氏の體用不二の哲學的卓越性を高く評價していたもの

の、どちらも意識的に更に廣い學問的道を歩んだため、教師の希望に従わず、獨立した繼承者になった。

唐氏の學問は自身の人生に對するはっきりとした經驗の獲得であり、人を感動させる力を持っている。彼は、人間は既に内在する超越的道德の自我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を肯定する。内在している仁心を透過し擴充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この仁心は天心に近づき、超越した自然と人生の包括は、且つまたこの仁心を普遍化して、自然と生命のすべてを觀照し、且つまた自然と生命の中でそれを實現し、人文科學を達成する。花や果物が落ちた（落ちぶれた）時代に身を置いているが、神木の根を自ら植え自ら勵ますことで、民族に、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人類の未來が新しい方向を見いだすことに期待する。彼は、中國の哲學と道德政治の精神は、みな原始的な天を尊重する精神から來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るので、中國文化は宗教がないのではなく、宗教の人文科學への統合であり、西洋の宗教精神の缺如を補うことができ、中國の將來の新しい宗教の基礎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る。併せて根源的に中國と西洋の文化の融合する方法を揭示するのに、太極・人極・皇極に（名前を）借り、その三極は常に變わることなく、「(天道が神妙な働き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圓にして神」といった中國の文化的精神は、「方以智」の西洋文化を含め、中國の將來の人文の世界を展開する事が出来ると説明している。以上が唐氏の思考の本質である。

牟宗三氏は、1909年6月12日に山東省棲霞縣牟家疇で生まれ、1995年4月12日に國立臺灣大學病院で亡くなった。1945年、37歳で成都の華西大學で教鞭をとり、初秋には成都から重慶に移り、招聘されて中央大學哲學科教授の職を受け、初めて唐君毅氏と働き始めた。二人はしばしば暇なときに互いに勵まし合って學徳を磨いたので、お互いを最もよく知っていた。二人は國民の將來を深く心配し、牟氏は竟に「歴史哲學」を書くことを思いついた。1946年春、中央大學が重慶から南京に戻るのに従って歸り、同年秋に氏は中央大學哲學科長の交代で擔任し、翌年も學科長を務め、1月には獨自に月刊誌「歴史と文化」を創刊したが、後に資金不足のため4號しか發行されなかった。その年の夏、牟氏は學科長を務めたことによって讒言を受け、大學は任命書を發行しなかった。唐氏は牟氏のために正義のために戦うために前に出たが、結果が出なかった。秋には、牟氏は金陵大學と江南大學の専任教授の招聘を受け、南京と無錫の間を往來した。唐氏もまた、中央大學を去り江南大學の教務部長に轉任した。

1988年11月1日から12月22日まで、牟氏は中央大學と再び縁を結び、現在の中央大學文學部の招待を受けてカント哲學の講義を擔當し、翌年4月18日から翌年5月23日まで、さらに中央大學でカントの美學について講義した。當時、講義教室は文一館の107教室にあり、學内學外の教師と生徒が聽講者としてたくさんおり、牟氏の講義スタイルを競い合っていて見ていた。いくつかの講義では、蕭振邦教授が板書を手傳った。教壇の下で聽衆は時には注意深く講義に耳を傾け、時には素早く書き留め、それぞれが全神經を集中させ、牟氏の莊嚴で力強い言葉が教室に絶えず響き渡った。

牟氏は常に人に嚴格なイメージを與えてきたが、ところが實は文學に於いても藝術の側面に遊ぶことについても素晴らしいところをお持ちだった。牟氏はまた、『紅樓夢』と『西遊記』についても以前研鑽しその上評論を作ったことがあり、新亞書院で教えたときには、好んで人と圍碁を差したが、そのコマの指し手は風のように颯爽としていた。餘暇には京劇も好み、かつて（京劇の傳統的劇目の一つである『水滸傳』の）「打漁殺家」を演じて見せたこともある。

牟氏の學問は、中國と西洋を融合するが、孔孟に歸屬している。彼はかつて、中國文化の核心は生命の學であり、外に事業を打ち立て、知識を追求する理想を開き、内にこれらの理想の眞の根源を浸透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理想を本當に理想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述べた。これがすなわ

ち生命の學の根本を確立しそれを對社會的に實踐することである。一貫して中國哲學の領域で先秦・魏晉・隋唐・宋明の各段階の思想的特色を探求することに盡力し、中國哲學の核心を見いだしている。西洋研究の統合という點では、カントの哲學は道徳性を重視し、中國哲學により對應していると考え、カントの「超越形而上學」を「知的直感」を導入して、「道徳的形而上學」へと發展させた。唐氏と同様に、文化の落ちぶれた時代に身を置いてはいるが、國民の命を救いたいと願い、西洋の純粹な論理思考の哲學に頼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價値の源を開くことができる孔孟の教に頼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深く考えた。牟氏は自ら、唐氏と比べると一貫して正面に焦點を當てて中國文化の精神と價値に支障なく通じ、人々が中國文化に對して適切な理解を生むようにさせたと言ひ、牟氏は中國文化の核心に對する批判に焦點を當て、汚れを洗ひすぎ、中國文化の健全な發展への道を開くために、進んで儒教の現在の使命は、列強（諸國）に對する局面を打開して新しい外王（の道）を開くことであると提案した。これを行う具體的な方法は、良知良能（生まれながらに備えている是非善惡を判斷する能力）を通して自我坎陷（自覺している自我を否定）することであり、一心が二門を開き（諸佛の覺りの本である衆生心が迷いの心による眞如門と生滅門二門の體大[本質]・相大[有様]・用大[作用]の三大という三つの普遍的な働きを開く）、道徳的な心の外で理性の役割を發展させ、科學的知識を習得し、民主主義の精神を學ぶことである。このようにして、儒教は現代でも發展し續け、その使命を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が牟氏の考えの要點である。

第4世代になると、唐氏と牟氏の弟子である王邦雄・曾昭旭・岑溢成・朱建民・袁保新の諸氏が、餘傳韜前校長の熱心な招請により、前後して中央大學文學部に入って教えた。王邦雄・曾昭旭兩氏の敘述によると、餘傳韜前校長は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學バークレー校の生物化學の博士であったが、その家に代々傳わってきた學問に深く影響されており、人文科學を非常に重視していた。餘前校長の父親はまさに著名な教育者の餘家菊である。家に傳わってきた學問の影響下、餘前校長は元々深く濃厚な人文科學を水が浸みこむように徐々に享受してきていたので、非常に人文教育を重視していた。中央大學の發展が理工學部に偏っていることに鑑み、文學部が中央大學全體における地位を高め、より大きな影響力を發揮し、中央大學が理工學專攻を發展させるだけでなく、高い人文リテラシーを身に付けられることを望んだ。

餘前校長は大學を統治するというビジョンを持っていたので、彼は常に人文科學の發展に氣を留め、新儒家に細心の注意を拂ひ、かつて臺灣師範大學に牟氏の講演を聴き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講演の後、餘前校長は臺灣師範大學の梁校長、牟氏と一緒に歩きながら、牟氏が中央大學に来て講演することを熱心に招請した。王邦雄氏の記すところでは、當時彼と他の牟氏の2人の學生は、牟氏の後ろに續き、牟氏は頭を回らせて彼を指さし餘前校長に、「彼は私よりも上手に話すので、あなたは彼を招いてください」と言った。當時44歳壯年だった王邦雄氏は、このような好機の下、餘前校長自らの電話での中央大學文學部の講演要請を受けた。餘前校長は「認知の心徳性の心と現代化」に關するスピーチを聴いた數日後、當時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科で教えていた王邦雄氏に電話をかけ、彼を招聘して中央大學で教えてもらうことを望んだ。

當時餘前校長は理想に満ちており、強力な人文科學チームを設立し、中央大學の校風を改善し中國文學科の實力を強化したいと願い、中文研究所と哲學研究所の設立も強く望んだ。王邦雄氏もそこで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科で教鞭をとった曾昭旭氏、香港の新亞書院（ニューアジアカレッジ）で博士號を取得して臺灣に戻ったばかりの岑溢成氏、アメリカの南イリノイ大學で博士號を取得したばかりの朱建民氏も推薦した。これらの先生方はすべて1985年に中央大學に赴任して教えた。1988年に袁保新氏も王邦雄氏から哲學研究所で教えるように推薦された。1992年には蕭振

邦氏もまた招聘を得て哲學研究所に入った。

これらの先生方は、卓越した學術上の成果を持っているだけでなく、優れたエグゼクティブな才能も持ち合わせている。曾昭旭氏は1986年から1988年まで中國文學科長を務め、1987年に中國研究所を設立した。翌1988年には哲學研究所が設立され、王邦雄氏が研究所の創設ディレクターを務めた。數年後、王邦雄氏は中國文學科の組織に戻り、曾昭旭氏・岑溢成とともに中國文學科の義理（學研究）の看板になった。朱建民氏と袁保新氏は哲學研究で影響力を發揮した。朱建民氏は、かつて哲學研究所の所長、學部長、主任秘書等の重責を擔い、現在は華梵大學の學長を務めている。袁保新氏もまた、哲學研究所の所長、總務責任者、主任秘書、南華管理學院の教務部長・副校長、醒吾技術學院の校長を歴任し、現在は明新科技大學の學長を務めている。蕭振邦氏もまた、かつて哲學研究所の所長代理および所長の職務を務めた。

王邦雄氏は退職の2年前、中國文學科の義理（學研究）の傳統を繼續す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り、2000年に劉兆漢前校長は、華南大學總合研究センターの准教授兼佛教研究センターの所長であった萬金川氏を推薦し、翌2001年にさらに文化大學哲學科の教授であった楊祖漢氏を推薦した。大學は演習方式の授業を準備し、二人の儒學及び佛教學の専門家を禮を厚くして招聘した。1996年、李瑞全氏は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の教務に就き、かつてその所長を務めた。

王邦雄氏の口述によると、彼は曾昭旭氏と2歳差とのことだが、曾氏は実際には1943年生まれである。岑溢成・楊祖漢・萬金川の三氏は彼より10歳若い。これらの先生方の努力のもと、中央大學での在職中、中央大學は最も美しい人文主義の風景の1つになり、中國文學研究所と哲學研究所の教授陣の強化だけでなく、中央大學での文學部の名聲も轟かせ、中央大學を新儒家の發展のための重要な中心地にさせた。

語るべき事は、李明輝氏と林安梧氏は中央大學で數年間兼任講師をしているが、特に林安梧氏は中央大學に長く在籍しており、1991年以來、中國語學科と哲學研究所で兼任講師として、現在も哲學研究所で授業を開講している。

第4世代の新儒家の學者は、熊・唐・牟諸氏の前任者の業績のもと、儒教の發展について考え續けた。主な道は2つあり、1つは引き続き教師の教えを廣めていくことで、前任者の考えを詳述し解釋を加えてわずかに調整することであり、李明輝氏は牟氏のカント哲學の説明を修正し、楊祖漢氏は宋明理學の研究に力を注ぎ、近年主に朱子の思想の解釋に焦點を當て、カントと韓國の儒教を通じて、牟氏の見解に對して新しい解釋を提案している。2つ目は、新しい發展の方向性を見つけることであり、王邦雄氏は老・莊の哲學に力を注ぎ、曾昭旭氏は唐氏の「愛の福音」に觸發されて儒教の愛の研究を發展させ、どちらも學校の内外の講義と多くの著作を通じて、現代人の心身の安定に大きな影響を與えている。袁保新氏は、牟氏のカント哲學によって中國哲學を解釋するアプローチを、ハイデガー哲學によるアプローチへと轉向し、孟子と老子の思想の形而上學的な部分に對して新しい見解を提供した。蕭振邦氏は中國と西洋の美學の發展に力を注ぎ、多くの素晴らしい見識を持っている。

岑溢成氏は學術研究を通じて、主に哲學の議題の新しい探求と經學研究の2つの側面で、中國哲學に對して極めて事物の本質を見抜く洞察に満ちた見解を提出してきた。哲學の議題の新しい探求には、孟子と荀子の考えを再考し、孟子と告子の辯論には倫理的意義が備わっ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孟子の）楊子と墨子に對する批判は人倫に基づいていること、そして荀子は活潑なヒューマニストであるとの指摘が含まれている。魏晉の思想を論じ、王弼の「大衍義」、「名」と「稱」の區別と「名」と「稱」の2種類の使用に焦點を當て、魏晉の重要なトピック「言意之辨（言と意の區別）」に焦點を當て、「言意之辨」の2つの重なっている面を指し示し、嵇康の獨自性は莊子

の思想を實踐することを通す所にあると指摘した。隋唐の學術では『因明大疏』の研究に専念し、インド佛教の「因明學」について詳細な議論を行った。宋明の學術では、朱熹の思想系統と、王良（心齋）の「安身」説を介して見ることが出来る王學（左派）の泰州學派の特徴に焦點を當てている。清代の學術では、阮元・戴震及び焦循による人間性の理論に焦點を當てた。經學研究のこの部分は、明らかに漢王朝、宋王朝、清王朝の經典を含む、特に清王朝の經學を要とする前任者の不足を補完した。乾嘉の焦循・惠棟・王念孫父子の『易』學研究にも力を注ぎ、清代學術史の學問史「漢學と宋學の論争」と「吳派と皖派の違い」といった難しい問題に對しても見事な見解を提示している。その貢獻は、中國と西洋の研究における強固な基盤を通して、力を盡くして重要な學術的問題を特定し解決したことにある。

林安梧氏は「後新儒學」の可能性を考えることに力を注ぎ、新しい思想體系を打ち立てようとし、牟氏の「執と無執による）存在の二層理論」の後に、さらに「存在の三態論」を提案し、またマルクス主義哲學と西洋哲學を組み合わせて批判的思考を開き、「心性の修養」よりも「社會正義」を優先し、「近代化による新外王の學習」を主張し一歩進めて「市民社會」の下での「倫理道德」をさらに再調整した。また儒・道・佛三教の價值を打ち立てることによって治療學の可能性と併せて、「中國の解釋學」のトピックを深く考えた。

この數年、文學部は儒教研究を推進するため、2002年に中國文學學科と哲學研究所による大學レベルの儒教研究センターを共同で設立し、楊祖漢氏は第4期センター長を擔當した。學術活動を継続的に推進し、學術會議や讀書會の開催、毎年2冊の「現代儒學研究」の發行を含め、過去3年間に現代新儒學に関する國際會議を3回連続で開催するなど、中央大學の儒教研究の推進に貢獻した。

現代新儒家の4世代の學者は、南京時代の東南大學と中央大學から臺灣の中央大學の再開まで、みな中央大學と深い縁で結ばれている。第一世代の熊氏、唐氏、牟氏三名の學者は、儒學の深い造詣と憂國憂民の心情によって、現代新儒家の最良の模範を打ち立て、中央大學の人類の文化・文明の發展のための長期的な目標を確立した。中央大學は將來、儒教研究の國際的據點となり、文化を傳承する叡智としての重責を擔い、豊かなヒューマニズム精神を時代に注入することを囑望する。

「當代新儒家與中央大學」105年07月（2016年7月）

注

- 1) 中島隆博「新儒家と佛教一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一」（岩波書店 思想No. 1002, 2007年10號）pp80-104
中島隆博『中國哲學史』一諸子百家から朱子學、現代の新儒家まで（中央公論新社 中公新書, 2022）
朝倉友海『「東アジアに哲學はない」のか—京都學派と新儒家』（岩波書店 岩波現代全書, 2014）
- 2)



2024年4月8日、「鵝湖人文書院」にて、潘鳳娟先生の出版記念講演會（楊祖漢先生の質疑応答）。



2024年7月30日、「奉元書院」における楊祖漢先生の講演の様子



庭園側から見た臺灣國立中央大學の文學部 文一館・文二館

- 3) 原文は大学のホームページにも記載されている。楊自平教授にも翻譯の了承は得ている。(https://in.ncu.edu.tw/alumni/enews/no25/text6_1.pdf。)
- 4) 杜維明は三期に分類する(『杜維明文集』第1巻, 武漢出版社, 2002年1月), pp295-296。『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二十期(中國文哲研究所(臺北), 2002年3月), pp375-376。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のモデル圖を加工。(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pp193-194。

分類	代表人物及び其の生卒年
第一代第一群	梁漱溟(1893年至1988年) 熊十力(1885年至1968年) 馬一浮(1883年至1967年) 張君勱(1887年至1969年)
第一代第二群	馮友蘭(1895年至1990年) 賀麟(1902年至1992年) 錢穆(1895年至1990年) 方東美(1899年至1977年)
第二代第三群	唐君毅(1909年至1978年) 牟宗三(1909年至1995年) 徐復觀(1904年至1982年)
第三代第四群	余英時(1929年至2021年) 劉述先(1934年至2016年) 成中英(1935年至) 杜維明(1940年至)

- 5) 「大道周行」は『老子』第25章の一節。「乾坤一場戲，生命一悲劇」は、例えば宋定莉著「乾坤一場戲，生命一悲劇：方以智晚節之平議」のように、現在でも多用されるテーマである。鵝湖月刊512期，鵝湖月刊社，2018年2月，pp26-32
- 6) 「聞思修」は、三慧（さんえ）。智慧を修行の順序によって三つに分類したもの。經典の教えを聞いて生じる聞慧（もんえ）、思惟・觀察によって得られる思慧（しえ）、禪定を修して得られる修慧（しゅえ）。
- 7) 「皇極」は『尚書「洪範」』の語。又「王極」という。應劭は「漢志」に「皇は大，極は中なり」と注をつけている。方以智(1611年11月30日-1671年11月9日)は、中國明末清初の思想家・自然學者・儒學者・禪僧。清への仕官を拒み流浪の僧となった。博物學・天文學・地理學・音韻學等について廣く論じた。三教合一の思想を説いた。
- 8) 「内聖外王」は當代新儒學にとって重要なテーマであり、宗教的・道徳的な修養を通して得られた内聖を現代における外王である「科學と自由」にどのように「開出」出来るかが問題とされた。牟宗三は自我坎陷（自己否定）というイレギュラーな手法（曲通）を通して外王に結びつけられると考えた。なお、「内聖外王」の語句の初出は『莊子』「天下篇」である。
- 9) 一心開二門は、『大乘起信論』の「一心開二門」思想による。天臺圓教もその考え方を取り入れている。
- 7) 名號は名聲。名號とは一般的に佛・菩薩（ぼさつ）の名。これを聞いたり唱えたりすることに功德があるとされる。特に、「阿彌陀佛」の4字、「南無阿彌陀佛」の6字をさす。
- 8) 大衍義とは魏 王弼の用語。『易』「繫辭上」に「大衍の數五十，其の用四十有九」とある。また、湯用彤に「王弼大衍義略釋」がある。1942年《清華學報》第13卷第2
- 9) 因明大疏とは『因明入正理論疏』3卷，唐窺基撰のこと。『因明入正理論』を註釋したもの。俗に『因明大疏』と言われる。玄奘の口授に基づいて因明に關する事項を解釋する。古くより中國・日本ではこの大疏を基本として研究がつづけられた。そのため、この書の注釋書が多く出ている。因明とは、インドでおこなわれていた廣義の論理學を指す。近年は佛教論理學などとも言われる。五明（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内明）の一つとされ、獨立した學問分野として重視された。
- 10) 王艮 1483-1540 中國，明代の思想家。字は汝止，號は心齋，王心齋。江蘇泰州の人。製鹽業者の子に生まれ38歳の時に王守仁に師事した。良知現成論を唱えて、王畿と共に二王と稱される。素王意識による淮南格物説を主張し、孝悌を人倫回復の原點として強調し、下層社會への教化に情熱を燃やした。王艮のグループを泰州學派すなわち王學左派という。
- 11) 清朝考證學は清代中期の乾隆・嘉慶年間（1736年-1820年）に全盛となり、全盛期の考證學を乾嘉の學、乾嘉學派という。乾嘉學派の代表的な學者としては、閻若璩・惠棟・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が列擧される。乾嘉學派の代表的な學者としては、閻若璩・惠棟・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らが擧げられる。その中で、惠棟の系統を吳派、戴震の系統を皖派と呼び、考證學の二大潮流となった。吳派は蘇州を中心とするグループであり、惠棟により始められ錢大昕によって大成された。一方、皖派は安徽省出身の江永によって始められ、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の四人によって發展された。皖派の主流を戴段二王の學と呼び、吳派と皖派の兩派は浙西學派とも稱される。浙西學派が顧炎武を始祖として音韻學・訓詁學・金石學といった言語學的研究や禮學を重視するのに對し、歴史學を重視する黃宗羲を始祖とする浙東學派があり、章學誠らがいる。章學誠は「六經皆史」の説を唱え、經書研究に史學的視點をもたらした。清代中後期には、汪中・阮元・焦循ら、主に揚州府出身の學者たちによって乾嘉學派の手法が繼承された。その後清代末期には、鄭玄に代表される後漢の經學よりも、前漢の經學、とりわけ公羊學に基礎を置く常州學派が隆盛となった。

参考文献

- 『牟宗三先生全集』，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唐君毅全集』，學生書局，1991年